

高等学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形势与政策

(第2版)

主 编 高江荣

副主编 糜红缨

主 审 赵发荣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形势与政策

(第2版)

主 编 高江荣

副主编 糜红缨

主 审 赵发荣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联系大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大学生正确分析判断国内外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战胜困难、迎接“十二五”规划中来,引导大学生树立为国分忧的思想,激励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本书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编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时效性和针对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势与政策/高江荣主编.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8(2011.1第2版)
ISBN 978—7—5612—2612—4

I. 形… II. 高… III. 时事政策教育—高等学校—教材 IV. G64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4746 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www.nwpup.com

印 刷 者:陕西天元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14.375

字 数:349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201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前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宣部、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以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教育部通知要求定期编写形势与政策教育宣讲提纲，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资源库。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印发《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我们组织了多年从事该课程的教学骨干教师编写这本《形势与政策》教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关怀，为此我们深表谢意。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阅了大量书刊、资料及网络资源，在此一并向有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由赵发荣担任主审，高江荣担任主编，糜红缨担任副主编，负责拟定大纲、统稿定稿。本教材具体章节分工如下：第一章（高江荣），第二章（糜红缨），第三章（赵伟），第四章（刘建清）、第五章（高蕾）、第六章（陈学风），第七章（姜燕），第八章（王焕成），第九章（余波）。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探讨与理论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框架体系和内容阐述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加之时间较紧，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使用者提出宝贵意见，批评指正，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形势与政策》编写组
2011 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1
第一节 辛亥革命	1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11
第二章 回顾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	27
第一节 前十个“五年计划”回顾	27
第二节 辉煌十一五	35
第三节 展望十二五	46
第三章 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53
第一节 扩大内需	53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60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问题	68
第四章 社会热点问题研究	78
第一节 校园安全问题	78
第二节 治理酒后驾车问题	82
第三节 房价问题	87
第四节 惩治腐败问题	89
第五节 群体性事件	93
第五章 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	103
第一节 气候变暖: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	103
第二节 博弈哥本哈根:拯救气候的最后机会	105
第三节 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	116
第六章 “博”动中国	128
第一节 世博会概述	128
第二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133
第三节 世博让生活更美好	142



第七章 新两岸关系·····	156
第一节 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156
第二节 两岸关系新发展·····	162
第三节 展望两岸关系·····	173
第八章 中国外交·····	179
第一节 中国外交亮点及大国关系·····	179
第二节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交·····	182
第三节 世博会与中国外交·····	185
第四节 中国外交的战略构想·····	192
第九章 国际形势综述·····	198
第一节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198
第二节 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204
第三节 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209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障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不仅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消极的影响，反而在客观上帮助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古人有“以史鉴今”之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的教科书，人类社会已经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学习和回顾党的曲折历史，就是要让每一位同志都懂得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来之不易，就是要让每一位同志都懂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一节 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再次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其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给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人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1895年）、维新运动（1895—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于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这一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话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依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避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其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二、革命的准备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日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力量，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做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

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三、武昌起义经过

早在1911年1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人凤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唯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历数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很有成绩，武汉可谓械精饷足之区；武汉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半壁，传檄可定；瑞徽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泽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入骨，义旗一举，全省百姓皆能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是广州所无可比拟的。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深感起义责任重大，日益产生了联合起义的思想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协商，于1911年8月最终决定联合。这期间，湘鄂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尤甚，已发展成为保路起义。清廷慌了手脚，四处调兵遣将前往弹压。9月21日，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抵川，鄂军第八镇所属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入川，另一部分兵力驻防汉阳、汉口和市外其他县，省城内外兵力仅十四个标约七千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兵士约占三分之一以上。战争打响以后，还会发生官兵反正。形势对武昌首义极为有利。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召开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六十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议决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人选。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内，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宝善里14号。起义日期定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在分头准备中，痛感时间紧迫，起义日期又延至10月11日。这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担心武汉一地发动起义靠不住，黄兴也有11省同时发动起义方能取胜的说法。这些消息传到武汉，又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一度迟疑。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前往搜查，受伤的孙武与其他在场的人迅速脱逃，但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查抄，刘公之弟刘同等四人被捕。湖广总督闻

报搜查和提审情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深感已是千钧一发时刻，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断然决定起义提前至当晚十二时发动，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随即派人火速向新军各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慌忙中投弹未炸被捕，彭楚藩亦被捉，蒋翊武因身着长袍马褂且蓄长辫未被军警注意，乘隙脱逃。党人杨宏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当晚十二时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0月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开，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七时许，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里首先发生兵士哗变，响起了枪声，有几个官佐被击毙，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见状，立即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兵士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约三百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熊秉坤胸怀全局，考虑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给起义带来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唯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系日知会会员，后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此人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兆麟不负众望，他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再次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城内外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在各起义部队向楚望台集结的同时，吴兆麟、熊秉坤已率起义部队向湖广总督署（今武昌造船厂）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不克而返。南湖炮队入城，楚望台、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战局出现转机。新军各标营更多的士兵起义响应，营以上军官绝大多数见势不妙，保命离营，此刻，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组织可靠兵力保卫督署，全剿起义士兵，致使进攻督署之战，连连受阻。此后，再次组织兵力进攻督署，且兵分三路，在大街小巷展开血战。由于天黑下雨，目标能见度低，炮屡发不中，于是有人冒死冲往督署附近纵火，以火光为标志，提高炮击的命中率。接着，督署签押房被击中。瑞澂和铁忠见大势已去，慌忙中打破署院后墙逃往长江的一艘兵舰上。张彪仍在其司令部（第八镇司令部在督署附近）顽抗。起义军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炮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天明前攻克了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张彪在其司令部被攻克前逃往汉口。随后起义军所向披靡，藩台衙门很快亦被起义军占领。

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

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四、辛亥革命的失败

革命的形势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911年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

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五、辛亥革命的影响

1.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2000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了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中山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2.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了冲击。

3. 经济影响

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到1950年，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4.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被称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

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辛亥革命对于 18 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5.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6.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 1911 年 12 月 29 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同时，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予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同时，这种思潮也带着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六、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障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不仅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消极的影响，反而在客观上帮助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辛亥革命的主要成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辛亥革命政治变革的第一个成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革命不仅敢于把“天子”拉下马，而且埋葬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废除帝制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创举，它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政治变革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尽管是软弱的和带有妥协性的，但是由于它的存在和对共和制度的推行，在全国确有许多省、市、县开始接受共和体制，对政权结构进行了某些改革。在民主共和运动的高潮中，南京临时政府根据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颁布了许多指示、法令，特别是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这些规定，尽管大多徒具形式，但是它毕竟交给人民一件保护自己和同反动派作斗争的法律武器，更重要的是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后来，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就是由于有了这件法律武器和这次民权的启蒙，多少改善了一些前清时代毫无民主自由的状态。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只能秘密传递，而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就得以公开发行，便是一例。

辛亥革命政治斗争成就的又一方面，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尽管在同盟会的纲领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宣言中，没有正面地提出反帝主张，甚至还幻想用保存清朝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去换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中立，但是，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不反帝，孙中山在反帝斗争中没有作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实际上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对此，毛泽东有公正的评价：“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其次，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特别是它的民族主义，贯穿着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平等思想。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说过：“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1906年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不至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后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的爱国反帝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税则自主等。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和反帝斗争，特别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国人民从 1840 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一些最初的政治障碍。

第二，宣传了民主和科学，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变革和成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宣传民主和科学，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和科学方面的成绩，并不比在政治上的胜利逊色。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

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了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在一段时间里，主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民主和科学，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和科学，招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民主，“比之清廷为尤甚”。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展开论战，论战在 1905—1907 年间达到了高潮。论战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建立共和国，要不要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空前的。通过这场论战，揭露了改良派抵制革命、维护专制制度和反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本质，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扩大了“三民主义”的宣传，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辛亥革命时期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作了思想准备，而且为而后的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提供了某些理论斗争的经验。

史实表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 20 多年中，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做了一定的奠基工作。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凡是革命，就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尽管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作用不能同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但无疑是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革命运动的。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短暂胜利和对“三民主义”的广泛宣传，曾经在全国出现了一片变革旧制度的强大声势，不仅冲击了封建经济基础，而且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有所遏制。此外，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期，还颁布了许多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法令，使广大城乡，特别是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度确实出现了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潮。据统计，1912 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 8 年间，新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的民族资本就达 1.3 亿元，几乎接近于过去 40 多年投资总额 1.5 亿元的水平。尽管新投资的资本的数量还不很大，但是发展的速度还是较快的。其间，虽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机遇，但是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有较快的增加。1900 年，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大约是 50~60 万人，而到 1919 年即接

近于 200 万人。由于数量的迅速增长和受到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列宁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年，就明确预言：“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二、辛亥革命的失败，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辛亥革命建立政权后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的失败，比它的胜利更使人惊心动魄。因为，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样震动亚洲和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推翻千年专制和建立共和国的伟大胜利，确实曾使人们一度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救中国。然而，严酷的事实是，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而且失败得迅速而彻底，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的胜利的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之间，反差太强烈了，它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这种情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人们开始发觉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符合中国国情，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辛亥革命的阶级局限性表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和发展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通过它们的代理人各派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统治和更加疯狂的掠夺。迫使中国人民完全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于是在中国孕育着一场新的高于辛亥革命的革命。革命的首要要求，就是动员民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既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能力将民族民主革命引向最后胜利。于是，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它要比民族资产更加阶级坚决彻底和强大有力。这个新生的政治领导者，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它从 1919 年的“六三”（“六三”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辛亥革命的时代局限性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辛亥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是密切联系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控制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障碍，反帝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辛亥革命失败，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袁世凯的狡诈，但主要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面临着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既不强，又不敢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更不敢真正依靠和发动工农民众，却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达到国家独立和富强，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反帝斗争中，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的那天

起，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既反帝，也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其反帝斗争，不仅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相联系，而且同反对资本的奴役相联系。这样，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在客观上便成了世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特别坚决彻底的原因之一。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具有许多特殊的优点，逐步取代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坚决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时代条件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

时代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从失败中，逐步认识到适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性。当他开始意识到导致他革命失败的某些真正原因，努力随时代前进时，已经遇到了适应时代要求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他领导的党，提出了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接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也就等于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行之于中国。非常不幸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后一年，他的“新三民主义”就被自称是他的“信徒”的人们所背叛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道路的破产，“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新三民主义”又被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所背叛，铁的历史事实和时代的要求，促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 1942 年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 1921 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这正是在提醒历史工作者要充分注意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只有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以来，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历程。

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谨慎的科学态度，果断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现代化建设，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对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产生了以邓小平命名的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时代特点的新